

多边关系框架下国民政府外交重心的转移（1937—1940）^{*}

肖自力 蔡 梓

摘 要：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本着“世界战争”和“国际解决”理念，其外交兼有战时特点和战前惯性，侧重联英、联苏。1938年10月起，美日在亚太冲突加剧，美国对援华制日开始抱积极态度，而英国在欧洲持续受压，不断对日本妥协。国民政府开始调整外交中的英美主从关系，战时外交呈现英苏美并重的多元化格局。1939年8、9月间，苏德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欧战爆发。为加入英法阵营，使中日战争与欧战同时解决，国民政府一度考虑对德国宣战或撤使，但在国际局势极不明朗的情形下，决定不公开地选择“英法路线”。在此过程中，美国因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民政府不仅以美国作为决定欧战政策的“标准”，更将之确定为外交的新重心。1939年后，美国明显加大援华制日力度，呼应及巩固了国民政府“首重美国”的外交决策，也使英苏两国相应退居中国外交“第二线”。

关键词：国民政府 抗日战争 中英关系 中苏关系 中美关系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也被牵入更复杂、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中。在中日战争前期，因应结交“与国”及选边站队需要，国民政府不断调整外交重心，改变外交投放重点，并于1939年欧战爆发后正式确立以美国为战时外交之重心。树立外交的中心或首要“与国”，是为了在战时众多外部因素中找到突破口，也是中方始终视中日战争为“世界战争”的结果。其时，国际局势极为动荡，德意日三国经过1936年的德意、德日协定，到1937年11月迅速集结为法西斯集团，而反法西斯阵营迟迟未能成型。两大阵营的发展、定型虽有其一定的方向性，也常有逸出此一方向的反常和反复，中国战时外交重心的转移即在此复杂背景下展开。

关于中国战时外交重心转移，过去许多战时外交史研究已提及。此类研究多基于双边框架或中方视角，相对孤立地看待中国与某个大国的关系及中方的政策输出，不大考虑其他大国的角色及中外之互动。实际上，中国不可能跟某大国单独打交道，英法美苏德诸大国之间、欧洲与远东之间及中外之间是互相牵制和影响的，基于双边或单边视角的外交史难以反映“世界战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华南抗战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6ZDA137）、广东省社科基金委托项目“广东抗日战争志”（GD18TW03）阶段性成果。

争”背景下中国外交及国际局势转变的复杂性,也使战时外交何时确立以美国为重心,此前是联英、联苏还是以英美、欧洲为重,英、美之间有何区别等具体问题,未得到认真梳理和讨论。^① 本文尝试建立“多边关系”分析框架,把英法苏美德等多个主要大国置于同一进程和场景之中,动态评估他们在中国战时外交的相对位置变化,同时考察国民政府如何因应列强激烈博弈的国际环境而作外交重心的调整。

一、抗战初期的外交惯性:联英与联苏并行

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前,列强因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而不断分化、重组,在冲击“华盛顿—凡尔赛体系”的同时,逐渐形成德意日法西斯集团和英法集团,分别扮演上述体系挑战者和维护者的角色。美苏两国虽孤立或被孤立于“局外”,但对国际局势的影响十分重要。在此背景下,日本的全面侵华为国际格局的演化增添了新变数。基于对国际大局演变的研判,国民政府自大战起即认为这场战争不是单纯的两国之争,而是“世界战争”。早在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强调中国抗战“非仅为中国,实为世界而奋斗”,^②已发其端绪。8月30日,蒋介石拟定“战时外交方略”,指出:“一、此次中国对日抗战结果,不仅影响东亚局面,并有牵动世界大势之可能。二、中国单独苦战不能为无限之支持,亦不能中途弃战求和,势必从世界大局上寻求出路。”^③再次确认抗战应定义为“世界战争”。中方广泛寻求“与国”,并利用“世界大局”变化使中日战争的“国际解决”成为必然选择。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全面应战,其外交开始展现“战时外交”的特点,而仍留有战前外交之惯性,表现为以联英与联苏为中心。上述“战时外交方略”认为:“中日战事苟有影响欧洲大局之可能,则操其枢纽者,全在英国”。^④把英国视为中日战争与欧洲大局之“枢纽”,就是战前国民政府追求“联英”的延续。早在1934年2月,蒋介石已提出“联英”,称“外交如非与英有切实合作联络之可能,则无成功之希望”,并有“重英轻美”之语。^⑤同年底,蒋考虑亲访英

① 同时考察中日战争前期中国与几个主要大国的关系变迁的研究不多,王建朗的《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仍分别论述中国与德、苏、英美等国的关系;鹿锡俊指出关于蒋介石的外交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日、苏、美、英、德之单边考察,强调应研究蒋对上述各国的综合因应,仍属中方视角(鹿锡俊:《蒋介石对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反应》,《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3期)。其他提及战争初期中国外交重心(或中心、重点)转移问题的论著,也未就此转移过程作专论,主要有朱坤泉的《论抗战之初国民党政府的对美外交》(《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孙艳玲的《抗战前期中国争取同苏联订立互助条约始末——兼析〈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1期)、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1911—1949)》(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81—182页)、鹿锡俊的《国民政府对欧战及结盟问题的应对》(《历史研究》2008年第5期)、彭敦文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4页)、齐锡生的《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15—16页)等。

② 《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1937年8月1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外交》,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7页。

③ 张世瑛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0)补编,台北:“国史馆”,2016年,第399页。

④ 张世瑛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0)补编,第401页。

⑤ 《蒋介石日记》,1934年2月12、1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国，^① 寻求中英合作突破。1937年3月，蒋系统反思中国外交，仍希望与英彻底合作。^② 在全面抗战初期的外交，英国占有突出地位。

最初，国民政府希望英国等西方列强调停战事或制裁日本。7月21日，蒋介石约见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H. Knatchbull-Hugessen），指“调解中日事件，此为最有效之和平方法”，希望许“特别努力，促其实现”。^③ 但英国处处强调必须英美联合行动。7月中下旬，中方两次向英国提出“借机”或“购机”，均遭拒绝。^④ 7月20日，英国外相艾登（R. Anthony Eden）向美国提到只有英美坚定、主动，才能阻挡日本。当美方回以英美可共同对日禁运时，首相张伯伦即指示艾登不要理会。^⑤ 8月26日，许阁森在沪宁公路被日机炸伤。蒋介石预料“此事必于我无损，而于倭不利，或于全部战局有关”。^⑥ 结果证明蒋太乐观。此时欧洲英意关系紧张，意大利通过支持西班牙佛朗哥军队，牵制英法。9月3日到任的英国驻日本大使克莱琪（R. Leslie Craigie）即以英国利益面临“潜在双线威胁”为由，认为以任何方式支持中国都将不必要地引起日本敌意，对中日战争应严守中立。^⑦

同一时期，相比英国的冷淡，美国的表现更加冷漠。7、8月间，英国几次向美国提议联合调停，均遭美拒绝。^⑧ 8月2日，外交部长王宠惠告诉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Dmitri Bogomolov）：美国“完全不干预，拒绝任何集体行动”。^⑨ 蒋介石怒斥“美国态度恶劣，而且变为毫无骨格之国”，总统罗斯福“应任其咎”。^⑩ 蒋托人转告美方，他对美国不与英国合作调停战事“深感失望”，“希望美国能维持自身在太平洋的地位并维护该地区的和平”。^⑪ 军委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也批评美国断送列强集体干涉的可能：“此次中日战事发生后，列国舆论可谓一致同情于我，徒以美国政府丝毫不愿采取干涉态度，遂致态度较为积极之英、俄、法诸国亦不采取任何共同干涉手段。”^⑫ 10月，美舰“帕奈”号在南京下关被日机炸沉，陈铭枢认为“将引起国际重大变化”，“英政府商请美政府派巨舰协同开赴东方，向日本示威”。^⑬ 但陈的预测同样过于

① 《蒋介石日记》，1934年12月23、25日、1935年1月15日。

② 《蒋介石日记》，1937年3月31日，本月反省录。

③ 张世瑛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0）补编，第122页。

④ 《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16日；《孔祥熙致蒋中正电》（1937年8月2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对英法德义关系（二）”，台北“国史馆”藏，002—090103—00012—164。

⑤ 《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下卷，武雄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593—594页。

⑥ 《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26日。

⑦ Antony Best, “Sir Robert Craigie as Ambassador to Japan 1937-1941,” in Ian Nish, ed., *Britain and Japan: Biographical Portraits*, Japan Library, 1994, pp. 239-240.

⑧ Andrew Kelly, “The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 Anglo-American Response,”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vol. 32, no. 2 (December 2013), pp. 30-31.

⑨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电》（1937年8月2日），李嘉谷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82页。

⑩ 《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18日。

⑪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John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23, 1937,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37, vol. 3,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4, pp. 460-461.

⑫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台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第41页。

⑬ 《附一陈铭枢日记（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编：《陈铭枢将军图文集》，北京：团结出版社，2018年，第222页。

乐观。美国拒绝英国提出的两国联合示威提议,^①事件在日本道歉、赔偿后很快平息。

在调停战事、援华及制裁日本等问题上,“英推与美,美推与英”,远东问题变成“英美间之球”。^②为解决中日争端,中国先后诉诸国联和九国公约签字国。9月27日,中方代表顾维钧等与英法两国代表商谈国联开会事宜,英方明确反对提出制裁日本,称“提出制裁的具体要求是一个巨大的错误”。^③结果,国联大会仅决议由各会员国个别考虑援华。几年后,中国外交部还对当年英国在国联的不作为深表遗憾:“英国为在国联中惟一有发言地位之国家……倘使英国之态度能更为积极,则我国自国联所得之收获,或不止于各国个别考虑援华办法。”^④英国通过比利时提议召开九国公约会议后,美国作为该公约发起国,颇怀疑英国想把远东问题扔给自己,极为不满。在各国保证会议不会对日本动武或实施制裁后,美国才勉强同意。会前,罗斯福扬言他不会允许英国把美国推到前面。^⑤为了营造良好的开会条件,中方还接受美方提出的无理要求,即中国代表在会议发言后退席,不参与讨论,并承认日本对原料来源之需要。^⑥如此委曲求全,仍未换来对中方更有利的结果。在美国最初所草拟的会议声明,本来还有拒绝承认中国现状改变、拒绝借款给日本等措辞,英国又坚决要求清除。^⑦英美此时的所作所为均不能满足中方援华制日的愿望。

中外学者多认为,中日战争爆发前后,由于蒋介石依赖英美或联英的战略落空,即转向联苏。^⑧其实联英与联苏并不是相互取代的。与联英一样,战初的联苏也是中方战前“备战外交”的惯性发展。九一八事变后,鉴于不可能同时与苏日两国为敌,中国于1932年12月与苏联复交。1935年,蒋介石主动打通苏联关系,但对联苏仍有疑虑。虽然西安事变的发动者要求联苏、联共,可到1937年3月,蒋仍主要考虑联英。直到5、6月间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访英“受挫”,蒋才指派随同孔出访的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访苏,并加派杨端六等十人赴苏,^⑨联苏始升温。7月13日,孔祥熙向蒋指出:“美对国外战事不愿实力参加,仅能予以道义上之援助”,“英虽

① B. J. C. McKercher, *Transition of Power: Britain's Loss of Global Pre-eminence to the United States, 1930-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48.

② 《蒋廷黻关于国际问题与苏联外交次长斯多蒙涅哥夫谈话记录》(1937年10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外交》,第202页。

③ “Mr. Edmond (Geneva) to Mr. Eden,” September 29, 1937,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DBPO), ser. 2, vol. 21, no. 270, F7228/6799/10.

④ 《外交部所编之“抗战四年来之外交”》(1942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外交》,第120页。

⑤ 孔华润:《美国领导人与东亚(1931—1938)》,入江昭、孔华润编:《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0页。

⑥ 参见《顾维钧报告与美国代表台维斯商议布鲁塞尔会议情形电》(1937年10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外交》,第34、35页。

⑦ 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63页。

⑧ Bradford A. Lee认为,由于“八一三”淞沪会战未引起英美干涉,蒋意识到西方外交官对日本影响甚微,即转向苏联(Bradford A. Lee, *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39: A Study in the Dilemmas of British Declin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39)。李君山则把1937年孔祥熙访英受挫(7月前)作为联英美与联苏的分水岭。(《蒋中正与中日开战(1935—1938):国民政府之外交准备与策略运用》,台北:政大出版社,2017年,第4、220页)

⑨ 参见《翁文灏日记》,李学通等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42、148—149页。

有意，但因欧洲内部关系，恐亦难成事实”，“（中国）所恃者，惟利害较切之俄耳”。^① 25日，孔与驻英大使郭泰祺、驻法大使顾维钧联名提议：“唯一的办法是以争取与苏联的军事合作为第一步，以英、美、法三国的物资援助为中国继续抗战的支柱。这样也迎合了英、美、法怕被拖入战争的恐惧心理。”^② 中国可利用苏日紧张关系寻求中苏军事合作，而对英美法，仅能争取其物资援助。

开战初，中方内部对联苏不无犹豫或怀疑。军政部长徐永昌以“俄人可虑之阴谋，举十三年事以证明之”。^③ 而陈铭枢力主联苏，反对既联苏又联德的“脚踏两头”行为。^④ 7月31日，蒋仍在比较联日与联苏、和与战之利弊：“倭要求我共同防俄，承认伪满与华北特殊化，若与俄先订互不侵犯约，则可先打破其第一迷梦，不再要求。盖允其共同防俄以后，不仅华北为其统制，即全国亦成伪满第二矣，故联俄虽或促成倭怒，最多华北被其侵占，而无损于国格……两害相权取其轻，吾于此决之矣。”^⑤ 随着战事升级，中方“和”的代价越来越高，可能性越来越小，而英法美列强对援华制日又互相推诿，联苏遂成为中国“从世界大局上寻求出路”的现实出路。9月9日，蒋深信苏联“为己不能不助我”。^⑥

为尽快取得苏联援助，中方放弃寻求中苏签订互助协定的立场。8月21日，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大批援助。11月，斯大林向中方承诺提供军火、教官等，暗示苏联是中国最坚定而可靠的盟友。^⑦ 此时，中国对苏政策虽可称为“联苏”，但不意味着联英已被取代。9月28日，蒋明确指出，“外交重点在英、俄”。^⑧ 如果说“备战外交”时期最早的联英还主要针对苏联，^⑨ 那么此时之外交则英苏并重。西方学者亦有类似的说法，指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苏联迅速成为对中国进行军事援助与供应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中国在远东大国平衡中的战略位置对英国又有着极大的重要性”。^⑩ 而且，中国此时之联苏仍需顾及英国和德国，^⑪ 这也是战前外交的特点延续。就德国而言，德日于1936年缔结防共协议后，中国联德的政治基础基本消失，但在大战初期，德国仍是与中国有着紧密军事合作关系的主要列强。

从战前延续到战争初期的联英，主要基于英国作为全球性帝国在远东拥有广泛利益，必不甘心将其拱手让与日本。正如1934年蒋介石强调“联英”时所说，“联络中国以直接巩固其在

① 《孔祥熙致蒋中正电》（1937年7月13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对美关系（二）”，台北“国史馆”藏，002—090103—00003—148。

②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87页。

③ 《徐永昌日记》第4册，台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84页。

④ 参见《附一陈铭枢日记（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编：《陈铭枢将军图文集》，第181、182、188页。

⑤ 《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31日，本月反省录。

⑥ 《蒋介石日记》，1937年9月9日。

⑦ 《斯大林与蒋介石特使关于援华问题的谈话记录（摘录）》（1937年11月11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707—708页。

⑧ 《蒋介石日记》，1937年9月28日。

⑨ 蒋当时在日记中说“将来东亚争霸者为中俄，而世界争霸者为英俄也”。（《蒋介石日记》，1934年3月7日）

⑩ Greg Kennedy, *Anglo-American Strategic Relations and the Far East, 1933-1939: Imperial Crossroads*,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2002, p. 76.

⑪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当天，蒋提醒自己“中俄互不侵犯（条）约，应与英、德说明理由”。（《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21日）

东亚、间接维护其在世界上之霸权，毋宁为英国所迫切祈求之事”。^①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蒋对英国期望激增，认为“日本占领上海以后的气焰……尤其英国是决不能忍受的”，“日本必将逼得英国迫不及待了”。^② 次年1、2月间，中方仍对英国充满期待。在武汉的英国外交官认为国民政府对抗战盲目乐观，是基于希望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自愿或不情愿地卷入战争的，^③ 甚至说政府中大部分声名狼藉的官员试图拖延战争，以吸引英国援助。^④

而英国的所作所为，让中方深深失望。1938年1月，两名英国警察在上海被袭击，英国向美国提议两国以海军共同威慑日本。当美国表示同意时，英国再次食言。^⑤ 2月，蒋介石告诉苏联人他已“不能指望英国同苏联共同行动来保障远东和平”。^⑥ 3、4月间，德国先兼并奥地利，又向捷克斯洛伐克提出苏台德地区的主权要求；德意两国又加大干预西班牙内战的力度，英法顿感欧洲危机重重，压力巨大。5月2日，英国对日本作重大让步，同意将中国日占区关税存入日本正金银行。与英国相比，苏联继续为中国提供大批援助，以致蒋介石承认“苏俄究为利害相共之国，应设法提携之”。^⑦ 3月1日，苏联向中国贷款5000万美元，用于购买苏联军火和工业设备。5月5日，蒋急电斯大林，请求苏联尽快向中国提供军火和新的贸易信贷，^⑧ 苏方随后均予以同意。但蒋对如何把握中苏的亲疏仍迟疑，6、7月间，时而提到“今日讲演对俄太重，而对其他各国太轻”，时而说“对俄之运用，此时应可逼紧一步”。^⑨ 蒋担心联苏造成英美对中国的疏远或反感，而中国抗战的严峻现实又使其无法不依靠苏联。

此时，与英苏在中国的突出地位相比，美国仍处于边缘位置，但国民政府已注意到它的重要性。1938年1月，蒋致函罗斯福，提到“此次远东大难之应付，各国均盼望美国之合作”，中国“希望美国之援助，尤属势所必然”。^⑩ 2月，蒋判断“美总统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志，含蓄不能过久，当于此一、二年内必有行动”。^⑪ 曾抨击美国“不作为”影响恶劣的王世杰发现虽然美国并未援华，“然就外交言，美与我立于同一阵线，而态度最坚决”，引以为“奇特”。^⑫

必须指出，此时国民政府对美国固然有期待，美方却没有积极回应，中方之期待几近于“单相思”。“在战争的第一年，华盛顿对援助中国几乎毫无兴趣”。^⑬ 罗斯福及其顾问们认为承诺

① 《中国之外交政策》（1934年3月7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2，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84年，第104页。

② 《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1937年11月19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4，第656—657页。

③ “Mr. MacKillop (Hankow) to Mr. Eden,” January 31, 1938, DBPO, ser. 2, vol. 21, no. 503, F1502/84/10.

④ Rana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London: Penguin Group, 2014, p. 109.

⑤ 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第187—188页。

⑥ 王真译：《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卢干滋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电》（1938年2月26日），《历史档案》1995年第3期。

⑦ 《蒋介石日记》，1938年2月1日。此语也是对蒋此前所说“倭害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的修正。参见《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1日。

⑧ 叶健青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1），台北：“国史馆”，2010年，第471—475页。

⑨ 《蒋介石日记》，1938年6月12日、7月1日。

⑩ 叶健青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1），第112页。

⑪ 《蒋介石日记》，1938年2月1日。

⑫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第93页。

⑬ John W. Garver, “China's Wartime Diplomacy,” in James C. Hsiung and Steven I. Levine, eds., *China's Bitter Victory: The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Armonk: M. E. Sharpe, 1992, p. 11.

保护欧洲和东亚的安全对美国没有什么好处。^① 蒋介石等多次致电、致函罗斯福，请求美国财政贷款，均遭婉拒。^② 蒋廷黻因看破“美国在短期内决不能前进”，认为苏联承诺“美进，俄亦进”毫无意义。^③ 这种情况下中方仍重视美国，主要是认识到美在亚太有重大利益，与不断扩张的日本必然发生对立和冲突。而与美国在欧洲的超然位置不过使之成为欧战潜在的有效力量不同，在远东，它却是大国均势中至关重要的军事力量。^④ 除了认识到美国的独特战略优势，中方还不断受到英法苏三国的鼓动。苏联的鼓动及承诺已如上述。英国外相艾登也向郭泰祺表示：“美国如调遣舰队赴远东，英国随时可大部分，甚或全力东渡。”^⑤ 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Alexis Leger）告诉顾维钧，苏联的行动将鼓励美国；若美国作出更多援助，英法“也会照样行事”。^⑥

1938年6月后，美国开始正视中日问题，而英国渐渐跟不上美之步伐。英国对华贷款仍阻力重重，“英国政府不肯公开的激怒日本……又闻在华英商，不愿激怒日本，故怂恿其政府勿担保此项贷款。”^⑦ 财政大臣西蒙（J. Allsebrook Simon）担心贷款非但不能确保中国在一年内取胜，反而招致日本的敌意，增加英国在欧洲与远东同时面临敌对的危险。^⑧ 7月10日，蒋介石鼓励英国对华借款，并举法国占领西沙群岛而“倭退缩”为例，指英若能如此，日“更畏惧无疑”。^⑨ 四天后，中方等来的仍是英国的拒绝，英认为“在现在国际情势下，恐增加纠纷及英方责任”。^⑩ 7月底，张伯伦仍为援助蒋长久思索，异常焦虑，^⑪ 但对日本的恐惧还是占上风。

同一时期，德国逐渐中止对华军事关系，而苏联继续从军事上援华。就此而论，苏对德是有取代关系的。7月1日，中苏签订第二笔贷款协定，共5000万美元。7月底，日苏在张鼓峰地区爆发激烈冲突，蒋介石重燃苏联参战的希望。蒋立即想到“问英美对俄倭之态度”，^⑫ 希望英美不要为苏联对日参战设置障碍。8月4日，蒋向苏方提议，无论苏日战或不战，“中国必与俄始终一致，利害与共，且惟俄马首是瞻”，“最好中、俄能再进一步合作，做到军事与外交皆能共同一致”。^⑬ 但张鼓峰冲突并未持续多久。对于蒋之提议，苏联明确回复既无意进攻日本，也

① B. J. C. McKercher, *Transition of Power: Britain's Loss of Global Pre-eminence to the United States, 1930-1945*, p. 342.

② 任东来：《中美“桐油贷款”外交始末》，《复旦学报》1993年第1期。

③ 《蒋廷黻关于对陶德曼调停看法致外交部电稿》（1937年12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外交》，第209页。

④ Greg Kennedy, *Anglo-American Strategic Relations and the Far East, 1933-1939*, p. 5.

⑤ 《驻英大使郭泰祺自伦敦致外交部报告与英外长艾登晤谈关于如何援助中国及召集咨询委员会等问题之谈话情形电》（1938年1月4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2），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81年，第23页。

⑥ 《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14页。

⑦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第124页。

⑧ “Note by Sir J. Simon on assistance to China,” July 1, 1938, DBPO, ser. 2, vol. 21, no. 596, Cab. 24/277.

⑨ 《蒋介石日记》，1938年7月10日。

⑩ 《驻英大使郭泰祺自伦敦致行政院长孔祥熙报告英阁议对五千万英镑金融借款未能通过现正进行出口信用贷款之商洽电》（1938年7月14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2），第202页。

⑪ Bradford A. Lee, *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39*, p. 136.

⑫ 《蒋介石日记》，1938年8月1日。

⑬ 萧李居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2），台北：“国史馆”，2010年，第145页。

不能与中国签订互助协定。蒋失望之余,不由感慨“是时代强勉中国以独立自由与自力更生”。^①几天后,蒋仍“与俄使谈话约一时余,讨论订约利害问题”,“力主公开订约”。^②日苏的冲突及稍后的“慕尼黑阴谋”均在短期内放大了蒋对联苏及苏联参战的想象。

而美国对远东问题的正视,突出地表现为6月11日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公开谴责日本对和平居民的轰炸,宣布实施“道义禁运”。国务院远东司官员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则提出中国对日抵抗不致崩溃对于美国及其他民主国家来说极为重要,只有中国的主权得以保存,美国的权益才能继续存在。因此,美国在力避卷入中日战争的前提下不应放过任何增强中国的抵抗意志与能力的机会。^③7月底,财长摩根索(H. Morgenthau, Jr.)主动提出中方可派陈光甫赴美商谈借款,他一定尽力促成。^④但在10月前,美国对中日战争的反应仍主要限于道义上。9月,当德国进一步声索苏台德地区主权,引发捷克危机,而英国对日又动摇时,蒋介石认定“欧战起后美国远东政策关于中国之命运至巨”,若美重申“对远东一贯之政策”,英国亦能坚定态度,^⑤可见美之重要性仍主要在于影响英国。

二、美进英退与外交中心的多元化

1938年10月,面对中国广州、武汉两大重镇相继沦陷,日本对美国在亚太的利益和安全威胁更加明显,美国开始调整远东政策,更直接地对抗日本扩张政策。美国政策大幅度地跃进,改变了战时外交最初英苏并重的格局。

10月6日,美国驻日大使格鲁(Joseph C. Grew)向日方递交照会,谴责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对中国的侵略,指责这些行为违背“门户开放”原则,严重损害美国利益。^⑥蒋介石认为这是“中日战争以来第三国对日本最强硬之表示”。^⑦10月25日,武汉沦陷之日,罗斯福嘱摩根索特召陈光甫和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许以借款”。^⑧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提出建设所谓“东亚新秩序”。18日,日本答复美国10月6日照会,公开否认九国公约等既存条约秩序。日本这些举动对美国的刺激,犹如火上浇油。作为对此之反应,12月25日,美国批准对华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蒋介石视此为“与敌最大之打击”。^⑨

10月10日,日军在广东登陆,进攻广州,而英美在华南均有特殊利益。10月21日,王宠

① 《蒋介石日记》,1938年8月24日。

② 《蒋介石日记》,1938年8月31日。

③ “Mr. John Carter Vincent of the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 to the Adviser on Political Relations (Hornbeck),” July 23, 1938,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38, vol. 3,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4, p. 236.

④ 《驻法大使顾维钧自巴黎致行政院长孔祥熙报告与美财长摩根索谈关于财政援华及派陈光甫赴美洽办进出口信用贷款等问题之谈话情形电》(1938年7月27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1),第234—235页。

⑤ 《蒋介石日记》,1938年9月19日。

⑥ “The American Ambassador in Japan (Grew) to the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and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Prince Konoye),” October 6, 1938,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Japan: 1931-1941*, vol. 1,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pp. 785-790.

⑦ 萧李居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2),第402页。

⑧ 《胡适致蒋介石电》(1940年7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54页。

⑨ 《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17日。

惠约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elson T. Johnson），告以“日侵广东，形势压迫……我方切望美方予我更大之援助，俾增强我抗争力量”。^① 11月4日，蒋介石约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 Clark Kerr），指出日占广州是“予中国及大英帝国以打击……夺取英国享有一百年来历史的地位，而一跃为东亚之盟主”，警告如英国仍不改变拒绝援华政策，“中国未来之国策与态度，或与远东有关之任何事件”，中方将不再与英国商量及合作。^② 11月6日，蒋再见卡尔，除了说明如果英国仍不准备援助中国，他将从别的地方寻求盟友；更声言如果中国愿加入日本的远东反英政策，那么，日本将放弃其自战争以来赢得的一切。^③ 紧接着，宋子文在香港也对卡尔说过类似的话，显示“中日合作”也不是那么遥不可及。^④ 卡尔承认由于英国对日本的恐惧，他们在中国的地位迅速下滑，提议英国迫切需要做点什么来恢复它。^⑤ 但英国正受困于欧洲的紧张局势，而行进在绥靖德日的路上，很难因为蒋、宋的警告或卡尔的建议而幡然变计。

9、10月间，国民政府进一步强调美国的重要性，并区分英、美，这被学者视为中国外交“已经形成了以美国为主的格局”，是外交侧重点“重大的历史性的调整”。^⑥ 可以明确的是，中方已对调英美两国在远东的主从位置。10月17日，蒋介石致函美方称，“日军在广州沿岸登陆对英国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威胁，对所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而言则是直接的挑战”。要解决远东问题，必须依赖美英合作，“而这一合作的领导必须来自美国政府”。^⑦ 这就是英美主从关系对调的明证。英国也再次明确远东领导权实属于美国，“英方随时愿与美国合作，不甘落后……故关键实在美”，^⑧ 并承诺在远东实施与美“平行信约”。12月6日，针对近卫“第二次对华声明”，英国亦声明不认可任何单边行动对九国公约立场的改变，并研究向中国提供出口信贷。^⑨ 7日，英国告诉美国已准备300万英镑作为中英平准基金，只要美国采取行动，就立即拨款。^⑩ 在美国批准向中国提供“桐油借款”后，英国亦很快宣布对华提供出口信贷，并于次年2月同意将中英平准基金借款增至500万英镑，大致相当“桐油借款”的数额。

的确，若单论美国，在1938年底，甚至更早，其政策已明显改变，但它在国民政府的外交

① 《王宠惠致蒋中正电》（1938年10月22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对美关系（二）”，台北“国史馆”藏，002—090103—00003—171。

② 《十一月四日与英使卡尔谈话节略》（1938年11月4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对英国外交（一）”，台北“国史馆”藏，002—080106—00057—006。

③ “Sir A. Clark Kerr (Changsha) to Viscount Halifax,” November 11, 1938, DBPO, ser. 3, vol. 8, no. 233, F11989/84/10.

④ Nicholas R. Clifford, *Retreat from China: British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37-1941*,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Ltd, 1967, p. 87.

⑤ “Sir A. Clark Kerr (Changsha) to Viscount Halifax,” November 7, 1938, DBPO, ser. 3, vol. 8, no. 211, F11990/184/10.

⑥ 王建朗：《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鹿锡俊亦称此时中国已从英美苏并列转向首重美国。（鹿锡俊：《国民政府对欧战及结盟问题的应对》，《历史研究》2008年第5期）

⑦ “Memorandum by the Adviser on Political Relations (Hornbec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17, 1938,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38, vol. 3, p. 322.

⑧ 《王宠惠致蒋中正电》（1938年11月24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对美关系（二）”，台北“国史馆”藏，002—090103—00003—194。

⑨ “Viscount Halifax to Sir R. Craigie (Tokyo) and Sir A. Clark Kerr (Shanghai),” December 8, 1938, DBPO, ser. 3, vol. 8, no. 322, F13048/62/10.

⑩ “The British Embassy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ecember 7, 1938,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38, vol. 3, pp. 581-582.

视野里是否已成为首要目标或中心,还值得探讨。事实上,此时中方对英苏两国仍极重视。从更长时段和多边关系框架来看,毋宁把此时之外交看作英美苏等多国并重的多元化阶段。1938年11月,蒋依据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之消息日确”,判断“此后国际形势必因此剧变,苏俄对我之政策与英、美,皆有进一步之可能”,^①同时对苏英美寄予希望。1939年1月27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宣言,列举英法美苏等国表现:“去秋敌军侵迫武汉,进袭广州……国际联合会适于此际集会,英、法、苏俄等各友邦仗义戮力,一致声援,爰通过盟约第十六条所规定之制裁,适用于日本之侵略”;到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同于此际,力持九国公约,对暴日作坚决之警告;英法继起,共维斯约”。^②蒋在此次大会既强调对苏关系:“日之大陆政策一日不取消,我与苏之外交亲善必能保持,至少有二三十年”,^③又明确须使英美苏三国联合,“须使英美联合,美俄一致”。^④有学者把“苏联对华提供军事援助,英国对华提供了少量的物资援助,以及美国对华提供财政援助”,视为英国外交部的“僵持”(stalemate)政策,^⑤可从外方角度体现此阶段中国外交的中心多元化。

1939年2月10日,日军登陆并占领海南岛。蒋介石认定这将“断绝新加坡、夏威夷岛、珍珠港英美海军根据地之联络”,“预料英美法俄列强不久必有积极行动之表现”。^⑥然而,最受威胁的英国未能如蒋所预期“有积极行动”。中国借此重提中英军事合作,英参谋部答复,“倘英与日在作战状态中,即考虑接受,现形势不同”。^⑦3月15日,德国撕毁《慕尼黑协定》并吞并捷克,把斯洛伐克变成保护国。欧亚局势同趋紧张,互相影响,英国更难坚持其远东立场。3月31日,英国拒绝中方增加中英平准基金借款的要求。4月13日,英国外相哈利法克斯(Edward Halifax)训令卡尔,“万一发生全欧性的灾难,英国在远东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日本。只要日本维持中立,哪怕是非善意中立,我们也将尽可能阻止它主动和我们的敌人站到一起。为此,在中日作战的情况下,我们要避免过于公开与中国政府合作”。^⑧另外,在财政援华方面,英国也逐渐跟不上美国的步伐。2月,英国在考虑对华汽车信贷时,即无法照美国对华贷款例,给予同样优惠。^⑨

“美进英退”及英美主从关系的变化,在进入1939年后表现更明显。5月31日,蒋认为“俄国态度显现冷淡”,“此英法亦然”,但“美国之和平与公义之传统精神则自不同耳”。^⑩6月上旬,美国对中方表示它时刻关注远东局势的发展,努力保护自身在华利益,并在可能和适当

① 《蒋介石日记》,1938年11月30日。

② 《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1939年1月29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544—545页。

③ 《王子壮日记》第5册,台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第37页。

④ 钱世泽编:《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2),台北:中华出版公司,2015年,第726页。

⑤ Greg Kennedy, *Anglo-American Strategic Relations and the Far East, 1933-1939*, p. 77.

⑥ 《蒋介石关于日军海南岛登陆问题谈话》(1939年2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外交》,第63页;《蒋介石日记》,1939年2月11日,上星期反省录。

⑦ 《杨杰致蒋中正电》(1939年2月24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对英国外交(一)”,台北“国史馆”藏,002—080106—00057—007。

⑧ “Viscount Halifax to Sir A. Clark Kerr (Shanghai),” April 13, 1939, DBPO, ser. 3, vol. 9, no. 6, F3024/2882/10.

⑨ 《财政部报告最近办理英国信贷经过情形代电稿》(1939年2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外交》,第447页。

⑩ 《蒋介石日记》,1939年5月31日,本月反省录。

情况下给予中国帮助。^①“天津事件”发生后，^②英国在稍事交涉后便选择妥协。7月24日，英日达成《有田—克莱琪协定》，英国竟承认无意赞助妨害在华日军之行动。此时，中方迭催英国对华借款，英方只称“在英日谈判期间，恐不易有所决定”；这又影响了在外交上与其亦步亦趋的法国，“法国对我借款，因观望英国而功亏一篑（筭）”。^③而本是旁观者的美国，却作出强烈反应。6月21日，针对日本在天津租界区别对待英美人士的做法，美国驻日本参赞杜门（Eugene H. Dooman）警告，如果日本政府以为只要避免侮辱美国人就不会引起美国对英国在天津的遭遇作出强烈反应，那是巨大的误解。^④7月20日，蒋介石致函罗斯福，除了提出美国加大援华制日力度，更希望如果欧战爆发，美国能“运用其至大之权威”，使英法不与日本妥协，罗斯福“实握有解决远东问题及其他世界问题之枢纽”。^⑤与两年前相比，将中日问题与“其他世界问题”连接起来的枢纽，已非英国，而是美国。对蒋的呼吁及要求，特别是中国受英日谈判影响而“法币惨跌……人心动摇，于此为甚”，^⑥美国及时作出回应。7月26日，美国通知日本将废止美日商约。从蒋急电胡适向美游说到美宣布废约，不到50个小时，中国“外交与金融皆得转危为安”。^⑦蒋特向罗斯福表达敬意，称赞美国此举“奠立太平洋和平基础”，^⑧“它来得十分及时”，“缓解了中国面临的极其严峻和危险的局势”，中方也“意识到几乎不可能再依赖英国政策”。^⑨

此时，英国对国民政府的重要性也比不上苏联。德国兼并捷克并占领斯洛伐克后，英法迫于德国咄咄逼人，开始与苏联进行合作谈判。对英之主动，蒋介石断定其动机不纯：“英国希望德国东进，使俄德接触，发生战争，以为以毒攻毒之计。”^⑩蒋又意识到欧洲合作的主动权也从英国手里转到苏联，指出：“观去年此时日记，英国对俄拒绝协商，而今则英反求俄共同宣言，此乃国际局势最大之转变”。^⑪这个“反求”即说明英苏关系主动权的易手。意识到这一“最大之转变”，中方积极向苏联施加影响，希望握有主动权的苏联向英法施压，将远东问题与欧洲问

①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Johnson),” June 6, 1939,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39, vol. 3,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5, pp. 180-181.

② 1939年6月，日本以伪海关监督程锡庚在天津英租界被暗杀为借口，要求英国作出一系列合作与让步，并以武力封锁天津英、法租界。

③ 《杭立武关于与英国驻渝代表裨德本商谈英日谈判及外汇等事情报告稿》（1939年7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外交》，第567—568页。克莱琪更认为即使美国宣布废除美日商约，也不足恃，最终使伦敦推迟就对华借款作任何决定，参见 Keith Neilson, *Britain, Soviet Russia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Versailles Order, 1919-193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310.

④ “The Chargé in Japan (Doom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ne 22, 1939,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Japan: 1931-1941*, vol. 1,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p. 652.

⑤ 《蒋委员长自重庆致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九国公约之维护、对华物资之援助与欧洲大势对于远东全局之影响三事申述所怀并提出美国当前所可采取之制日援华方法函》（1939年7月2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1），第82—86页。

⑥ 《蒋介石日记》，1939年7月22日。

⑦ 《蒋介石日记》，1939年7月23日；7月29日，上星期反省录。

⑧ 《蒋介石日记》，1939年7月30日。

⑨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John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ly 31, 1939,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39, vol. 3,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5, p. 562.

⑩ 《蒋介石日记》，1939年3月18日。

⑪ 《蒋介石日记》，1939年3月25日，上星期反省录。

题一并解决。王世杰请王宠惠“托苏俄向英法接洽，以英法援华与于必要时执行国联对日制裁案，为苏俄参加欧洲方面军事行动之条件”。^① 蒋亦认为“对俄应急进，对英法应催促勿延”，^② 电令孙科“请俄当局勿忘远东……望能促成中俄英法在远东具体之合作”，^③ 并向斯大林说明“如欧战发生，日本必更扩大其侵略野心，远东大局必益形严重”，希望苏联“与英法交涉时，特别提出远东问题之重要性，及其与集体安全制度不能分离之理……使欧亚问题得在同样原则下同时解决”，强调“务望与英、法讨论时特别注意及此”。^④ 中方在极力向苏联游说的同时，也不放弃影响英法的机会。6月19日，蒋会见英国人李滋罗斯（Frederick Leith-Ross），提出建立中苏同盟的可能性并作出远东区域合作的安排。英国外交部官员对此表示怀疑，认为欧洲与远东关系密切，苏联绝不会在控制欧洲前出手干预日本占领中国，那里不涉及苏联利益。^⑤ 与蒋的认知相反，英国不认为苏联重视远东过于欧洲。

由于在欧洲合作上认定“英不如苏”，国民政府除了重苏轻英，也不大察觉苏联在慕尼黑会议后出现的细微变化，^⑥ 并在英法苏谈判僵持时将责任归于英法。其实，对于另一种可能，即孤立感强烈的苏联将在欧洲大国博弈中采取更灵活策略，或弃英法而联德，国民政府高层不是毫无预感的。2月16日，蒋认为“苏俄将对欧战置身事外，而德意且将专对英法”，苏将取得“举足轻重之势”。^⑦ 苏联必有某种“待帝国主义国家自相战争以后，方可起而消灭帝国主义之传统政策之阴险”，必待“双方帝国主义者战争火拼，而实行其世界革命”。^⑧ 5月3日，苏联政府任命莫洛托夫（Molotov）为新的外交人民委员。蒋断定莫氏上台后“俄之外交联德或有可能，而联倭则甚艰难，以倭之传统政策在排击苏俄”。^⑨ 蒋预感苏联可能联德，却是以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成见为前提的。

5月11日，日军突然向苏联发难，日苏在诺门坎发生激战，这立即转移了蒋介石对苏德妥协的警觉，对苏“特殊期望”猛增。^⑩ 他认为“以俄倭近日边境冲突之多……俄倭似不妥协”，日本鼓吹“德、意、俄、倭四国同盟之说”是“恐吓吾人之计”。^⑪ 蒋又臆断苏联拖延英法苏谈判用意在于阻止德日结盟，以对日开战，其实是想“单独专力对倭”。^⑫ 王世杰在得知苏联开会商讨诺门坎战事后，预测英法苏谈判“或因是而可速结”。^⑬ 两人均认为苏联为全力对日作战，有意推

①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第188页。

② 《蒋介石日记》，1939年4月12日。

③ 张世瑛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2）补编，台北：“国史馆”，2016年，第563页。

④ 《蒋委员长自重庆致立法院长孙科告以致史达林委员长电之内容在说明希望苏联与英、法交涉时特别提出远东问题之重要性及其与集体安全制度不能分离之理请译陈史达林委员长电》（1939年4月25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2），第410—411页。

⑤ Keith Neilson, *Britain, Soviet Russia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Versailles Order, 1919-1939*, p. 177.

⑥ 1938年10月3日，德国驻苏参赞向德政府报告，苏联对“盟邦法国不那么友好，而对德国的态度将‘更加积极’”。（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中册，李耐西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第597页）

⑦ 《蒋介石日记》，1939年2月16日。

⑧ 《蒋介石日记》，1939年4月14日；4月30日，本月反省录。

⑨ 《蒋介石日记》，1939年5月6日。

⑩ “特殊期望”是蒋介石1939年4月时用语，见《蒋介石手订“现阶段之军事外交宣传要点”》（1939年4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外交》，第66页。

⑪ 《蒋介石日记》，1939年5月29日、6月2日。

⑫ 《蒋介石日记》，1939年6月24日，上星期反省录。

⑬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第210页。

迟或“速结”英法苏谈判。秉持这一思路，蒋介石等高层对8月以后接连发生的苏德缔约、欧战爆发以及苏日也开始妥协，多少有些措手不及。

三、“首重美国”与英苏退居“二线”

1939年中，欧洲局势接连剧变，深刻影响中国抗战及战时外交。是年夏，英法苏谈判和英德谈判同时进行，僵持不下。为了在大国博弈中争取更大主动，苏德也于8月开始秘密谈判，23日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法苏之间本已订有相当于军事同盟协议的《法苏互助条约》，加之7、8月间不断传来英法苏谈判将成的消息，故苏德订约使蒋介石十分意外。^①

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英法随即对德宣战，欧战爆发。此时蒋对苏、对英都有不满。他特别感慨：“以后对英、对俄之外交，不能不特别慎重也。”^②对英国，蒋认为其对苏祸水东引、“以毒攻毒之计”以及对德国的绥靖都过了火。对苏联，他认为苏联联德固有所得，“所失亦大”，其外交策略“殊令各国生畏”。^③痛定思痛，蒋更强调中国抗战应“不稍存依赖之心，更无利用国际形势之念”，但仍坚持中日之战是“世界战争”的起点和重心。^④

苏德缔约后，中国极力打消英国对日本妥协。8月26日，外交部急电驻英使馆，称英国对日态度“殊为我方今日最关心之问题”，希督促英国“勿牺牲中国而与日本谋妥协”。^⑤8月29日，蒋接到密报，“英法将与倭寇妥协，而望我和平”。^⑥中方积极策动美国，希望其对英发挥特殊影响。8月底，外交部电告胡适，指出“美国此时言行最关重要，切望美国力促英方勿对日过事让步”。翁文灏亦电胡适，指出“远东事，英、法势难兼顾，尤赖美国支持，亦非有美国明切表示，不易使英不向日迁就”。^⑦蒋除电嘱顾维钧密会美国驻法大使（此人与罗斯福关系极密），使美国为“英法苏之中介”外，^⑧又召见詹森，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只有美国才能解决远东问

① 7月9日，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联名致函蒋介石，提到与英法谈判若有结果，则“远东包括在内”之联合组织“必成为有效之步骤”。（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2），第425页）8月初，在蒋预定的本月大事中，还列有“英俄互助协定之成立”。（《蒋介石日记》，1939年8月1日，本月大事预定表）8月1日，斯大林在给蒋的信中许诺“英、俄谈话成功时，远东问题必在其内”。（《蒋介石日记》，1939年8月1日）8月17日，蒋认为“苏俄对英法互助协定提远东在内，英、法当不反对，则世界和平之希望又进一步……俄对倭作战或已决心矣……英在新嘉坡增重兵，英、俄对倭压迫不远矣”。（《蒋介石日记》，1939年8月17日）他甚至猜测英法苏已在商定远东对日作战计划，“英、法、苏会议对远东问题，对倭作战计划岂果商定乎？”（《蒋介石日记》，1939年8月20日）

② 《蒋介石日记》，1939年8月23日。

③ 《蒋介石日记》，1939年8月23、24日。

④ 参见《蒋介石关于欧战前之国际形势的谈话》（1939年8月28日）、《蒋介石对欧战爆发之表示声明（节略）》（1939年9月9—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外交》，第71、73页。

⑤ 《外交部致中国驻英大使馆》（1939年8月26日），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4卷，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68页。

⑥ 《蒋介石日记》，1939年8月29日。

⑦ 《外交部致胡适电》（1939年8月27日）、《翁文灏致胡适电》（1939年8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22、23页。

⑧ 《蒋介石日记》，1939年8月28日。

题,希望美国警告英法不要让日本来保障其远东利益。^①但欧战随即爆发,英国在欧洲自顾不暇。“欧战的到来没有颠覆英国的东亚政策,但它改变了英国所面临的各个问题的相对重要性”,英国先前高度关注的中国海关完整、长江重新开放、租界地位维持等问题,均明显让位于其战时更优先的问题。^②远东及中国在日本的边缘化,即意味英国在中国外交影响力的弱化。

同期,苏日也有妥协或联合之势。利用苏德缔约的契机,德日均摆出调和苏日矛盾或苏日和好的姿态。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在多个场合放出调和苏日矛盾的风声。日本亦从而诱之,企图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演讲,“对倭期待妥协商,而对华未及只字”。^③至此,中方内部许多原来就对苏联不看好的人,指责苏“真面目毕露矣”。^④9月15日,苏日签订停战协定,中国“一般国民之精神或受有影响”。蒋想到“内有川事未定,外遭苏倭妥协,而又闻苏军侵波,不胜为世道人心悲也”。^⑤18日,翁文灏致函蒋,主张“中国宜向苏联请转向日商远东和平、中国主权独立,如不能成,继续抗战,求苏协助,赠以西北利益,相机加入民治集团,争取最后胜利”。^⑥这是考虑最坏情况下不得已的选择。到此地步,要么中国向日本“商远东和平”,要么向苏联出让西北利益以换取其容忍中国加入“民治集团”。不得不说,抗战中国到了艰难的抉择路口。

欧战爆发后,英法与德开战。国民政府希望通过在欧战中选边站队,使中日战争真正变成“世界战争”,而与欧战同时解决。本来,一年前欧战之说甚嚣尘上时,中方已有应对预案,即“万一欧战爆发,并扩大至远东,我国与英法俄合作,共同作战,以期中日问题得到根本解决”。^⑦彼时英法苏三国犹被视为一体,此时英法与苏却严重对立,加上中日苏三国紧密的地缘关系以及中日战争以来苏联对华的支持、援助,原本顺理成章的选择变得异常困难。中方内部大致有两种意见,蒋介石笃定英法将在欧洲对德战争中取胜,担心日本“乘机联英反德,而我则陷于孤立之地”,力主对德宣战;^⑧王世杰大体同意,惟以苏援不继为虑,但坚决反对联德或放弃亲英法的预案。王宠惠、张群、孔祥熙、朱家骅等则持另一种意见,主张先守中立,或不作鲜明表态。其间还出现蒋介石下令驻德大使回国、而孔祥熙擅自取消,以及

① 《蒋介石日记》,1939年8月29日;“The Ambassador in China (John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30, 1939,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39, vol. 3, p. 218.

② Nicholas R. Clifford, *Retreat from China: British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37-1941*, p. 130.

③ 《蒋介石日记》,1939年11月30日,本月反省录。

④ 张力编辑校订:《金问泗日记(1931—1952)》上册,台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6年,第378页。有关戴笠、唐纵、甘介侯、翁文灏、王子壮等此时对苏联的怀疑或指责。参见蔡梓:《危局中的变与不变——蒋介石的苏联认知与对中共问题的因应(1937—1940)》,《党史研究与教学》2018年第2期。

⑤ 《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16、17日。“川事”指1939年8、9月间四川军人联合以武力驱逐亲中央的王缙绪而出现的政潮。参见黄天华:《四川政潮与蒋介石的因应(1937—1940)》,《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

⑥ 《翁文灏日记》,第373页。

⑦ 《王世杰呈蒋中正签呈》(1938年9月14日),“蒋中正总统文物·重要声明(二)”,台北“国史馆”藏,002—080106—00002—002。

⑧ 《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6日。8月底,蒋考虑日本外交有三种可能:“与英美法苏妥协,单独对华”;“与英美法妥协,以全力对华、俄两国”;“与英美法及中国妥协,单独对苏”,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将与英法美“妥协”。(《蒋介石日记》,1939年8月30日)

王宠惠、孔祥熙先后“擅自”请求美国调停中日战争等风波。^①值得注意的是，蒋在8月25日还认为“中国不宜攻击（言论）任何外国”，^②9月初却急于对德宣战，反映出急于使中日战争与欧战同时解决的心态。

9月9日，蒋在欧战爆发后首次“半公开”表态，仅声称要赞助被侵略国，并尊重国联义务，而连这个表态当时也未发表。^③9月中旬，苏联态度愈加模糊，王宠惠、张群更促蒋勿表明态度。^④其实，对于选择加入英法阵线，蒋介石等初无多少犹豫。9月2日，蒋预料英法必将在欧战中取胜，故“我必须提前加入英法阵线，使倭不能加入”；“我国对欧战之政策，主旨在参加民主阵线，以为他日构（媾）和时，中、倭战争必使与欧战问题联带解决”。^⑤但对是否公开此一“主旨”或通过对德宣战的方式达到加入英法阵线的目的，中方内部分歧极大。9月12日，蒋决定坚持“英法路线”，但不对德国宣战或直接参战，而以军事以外方式助战。^⑥17日，苏联进军波兰，形成与德国合击波兰之势，蒋这时却庆幸先前对欧战态度的宣言“慎重未发，留有运用余地”。^⑦11月初，中方向英方提出“希望英苏国交不破裂，万一破裂，中国决不放弃英国友谊”。^⑧11月8日，王世杰向胡适等交代，“政府重视英、美过于其他友邦，惟不可公开表示”。^⑨

国民政府外交抉择的迟疑、反复，除了因欧战初起、战局一时难以判断外，更在于对中苏关系和苏援中断的顾忌。若中国对德宣战，虽可能阻绝蒋“最为可恶”的后果即日本加入英法阵线，^⑩但苏联基于与德国的条约义务，也可能不再援华。最后，中方决定半公开地站到英法阵线。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因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9月7日，蒋即认定中国“对欧战参加与否，应视美国态度为标准”，因“远东问题之根据在九国公约，其重心在美国”，^⑪而美之态度显然支持英法。12日，蒋致电胡适，希望他向罗斯福表达“远东和平，中国决以罗总统之主张是视”。^⑫在英法与苏联对立、苏敌友不明之下，美国的中立、超然地位及其对中国的支持，使其成为中国外交目标中相对清晰的一个。中方最担心的是加入英法阵营后对中苏关系带来的冲击，但考虑到美国的最后及决定性作用，即“言现实，则对俄之态度为重，而不可遗忘美国最后关系之重大也”，^⑬美国因素终压倒苏联因素。而正在欧洲苦战的英法也再次把美国推到前面。法国提醒中国：“中国应该把它的全副精力，百分之百地贯注到美国方面。美国的手是自由的，它

① 详见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第220—222页；《翁文灏日记》，第380、386页；《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29日。

② 《翁文灏日记》，第364页。

③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第222页。

④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第223页。

⑤ 《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2日；同日，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

⑥ 《蒋中正致郭泰祺、顾维钧电》（1939年9月13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对联合国外交（二）”，台北“国史馆”藏，002—080106—00015—002。

⑦ 《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16日，上星期反省录。

⑧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第234页。

⑨ 《王世杰致胡适、颜惠庆电》（1939年11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26页。

⑩ 《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7日。

⑪ 《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7日。

⑫ 《蒋中正致胡适电》（1939年9月12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对美外交：一般交涉（一）”，台北“国史馆”藏，002—020300—00028—015。

⑬ 《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7日。

有强大的舰队和巨大的资源。美国是唯一能够遏制日本最终促成满意结局的国家。”^① 英国对于中方的借款，则答应“应俟美借款成后提出”。^② 11月初，蒋再次明确：“对欧战与英法之关系，以美国为标准。”^③ 对此，朱家骅作了更清楚的解释：法理上中立的美国“事实上却援助民主国家”，而“英美是不可分的”，美国如放弃中立，即“参加民主阵营作战”。^④ 至此，以美国为国民政府的外交重心基本定局。中方不断调整的外交重心，经过两年多英苏并重及外交中心多元化的调整，最终转向“首重美国”。就西方列强在远东的势力及英美全球领导地位的变迁而言，随着1940年法国陷落与不列颠战争开始，英国作为远东列强领头羊的角色正式被美国取代，美国成为在远东应对日本的主要列强。^⑤

1940年初发生的存越矿产品风波及“薛伦加”（Selenga）号事件，从对外运输和贸易的角度说明此时美国之于中国的重要。此前，中国对苏德从事以矿产品换购军用品的易货贸易。1939年9月底，英国已要求中国报告从香港运出矿品的去向，后又宣布海上运德货物一律没收；^⑥ 苏芬战争后，开始扣留运苏货物，这就使中苏、中德易货贸易陷于困境。12月底，由于法国下令其殖民地越南禁止运出中国矿品，中国积存于越南海防的钨砂达3000多吨。1940年1月8日，苏联货轮“薛伦加”号满载中国易货矿品，从马尼拉出发后，遭英国军舰扣押，交由法国押回越南处理，中国存越矿产问题益加复杂。翁文灏与法方反复磋商存越钨砂的分配，双方对拟运往英法美三国的钨砂并无争议，但对运苏400吨钨砂，法方始终不同意。其间中方曾出示苏联决不将中国矿产转交他国的承诺函，但法“仍不以为可”。^⑦ 6月，中方将钨砂尽售于法，但法很快在欧战失败，实际未成交。此时，中国存越矿品有被日本劫掠之虞。中方紧急商请美国予以协助，美方同意立即收购全部存越矿品。^⑧ 由上述矿产品运输风波不难看出，此时中国的对外易货贸易存在很大风险，而美国以中立大国地位，减少了中国对外贸易的损失。

国民政府把美国确立为外交中心，也得到美国回应，中美之间逐渐开始双向而行。1939年10月19日，胡适来电表示美国7500万美元借款有希望，格鲁则在日本“明言”不接受日本“东亚新秩序”，“措辞极为畅直”。^⑨ 年底，美国对日禁运原料的范围逐步扩大。次年3月8日，美国向中国提供2000万美元借款。30日，汪精卫伪政权成立，赫尔声明不予承认。赫尔甚至传

① 《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第64页。

② 《翁文灏日记》，第391页。

③ 《蒋介石日记》，1939年11月3日，1939年之“杂录”。

④ 《第二次欧战爆发后之国际形势》（1939年11月28日），王聿均、孙斌合编：《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台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第507页。

⑤ Nicholas R. Clifford, *Retreat from China: British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37-1941*, p. 147; V. H. Rothwell, "The Mission of Sir Frederick Leith-Ross to the Far East, 1935-1936,"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18, no. 1 (March 1975), p. 147. 有关英美全球领导地位变迁的集中讨论，参见 B. J. C. McKercher, *Transition of Power: Britain's Loss of Global Pre-eminence to the United States, 1930-1945*, pp. 339-343.

⑥ 《翁文灏日记》，第376、398页。

⑦ 《翁文灏日记》，第423页。

⑧ 《翁文灏日记》，第479、480页；《翁文灏请奖励洽办中国存越物资售美有功人员致行政院呈》（1940年9月1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外交》，第371、372页。

⑨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第230页；《翁文灏日记》，第387页。

话给中方，希望中国舆论对美发出“责备”之词，“以便利（美）政府政策之推进”。^① 6月中旬，两位主张对日强硬的共和党人史汀生（Henry L. Stimson）、诺克斯（Frank Knox）进入内阁，增强了美国政府内强硬派的力量。7月12日，日本决定与德意同进退，这使日美在全球战略上处于根本对立。美国更需要中国坚持抗战，它对日本的禁运逐步升级，对华借款则不断增加。美方一系列举动呼应和巩固了中方“首重美国”的决策。

在确定以美国为中心的同时，英苏两国在中国外交退居第二线。这种“退居”实由于美国地位的跃进而造成。对国民政府来说，本着多求友、少树敌的原则，并无刻意忽略英苏两国之意，同时更有意控制国内对任何国家尤其是对苏联的批评。欧战爆发后，为了维护苏联形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要求各地“对德苏互不侵犯协定与此次欧战之关系，不作任何分析与批评”。^② 而在蒋的日记里，则痛斥苏联“诱引倭寇”，“左倭右德”，以称霸欧亚两洲。^③ 他终于承认苏德订约“于我更为不利，此乃意料所不及”。^④ 1939年底，因苏芬战争问题，苏联对中国没有在国联就开除苏联会籍一案投反对票极不满（中国投弃权票），对援华转趋消极。次年初，蒋痛感苏联对华冷淡，军援断绝，感慨“对俄外交令人疑惧，殊费心神”。^⑤ 2月29日，苏联驻华大使当面质问孔祥熙为何“中文报纸字里行间对苏不满口气，接近英法”。^⑥ 3月初，苏联对华援助交货极少，蒋以“不伎不求”自勉。^⑦ 此时，迁延日久的天津存银事件继续发酵。英国顶不住日本封锁英租界的压力，要求提取一部分存银并封存全部存银，中方坚决反对，并特别向英国指出：“在此美方正加紧援助我方时，英方又有所让步，殊可抱憾耳。”^⑧ 而英国因欧洲战局失利，仍对日让步。6月12日，英日签订天津白银协定。此时，蒋认为英国已不能实践其与美国的“平行信约”，“所谓平行路线已断”。^⑨

1940年6月，英法联军战败，意大利向英法宣战，法国投降，英国集中力量保卫本土。在日本压力下，6月20日，法方停止中国从越南运输，英方也承受滇缅路停运的巨大压力。中国抗战外援濒于断绝，前途未卜。一些中方要人已经想到“中国全归日本统制时”种种惨状。^⑩ 蒋也一再提到此时为三年来“最大最危之关键”，“抗战以来未有之难局”。^⑪ 中方紧急策动美国向英国喊话，“且勿太迟”。^⑫ 美国即声明反对封闭世界贸易通道，向英施压，同时表示愿借款给中国购买苏联军械。^⑬ 但英国仍顶不住压力，宣布封锁滇缅路三个月。蒋连用两个“必牺牲”来表示愤怒：“其结果必牺牲中国之友谊，且必牺牲英国在远东之地位”，并“威胁”英国必为此

①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第261、264页。

② 《广东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快邮代电》（1939年9月），广东省仁化县档案馆藏，全宗号001，目录号A12.1，案卷号0563上—010。

③ 《蒋介石日记》，1939年11月2日。

④ 《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30日，本月反省录。

⑤ 《蒋介石日记》，1940年1月20日，上星期反省录。

⑥ 《翁文灏日记》，第435页。

⑦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第255页。

⑧ 《杭立武报告与卡尔大使商谈处置天津存银问题情形函稿》（1940年2月1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外交》，第572页。

⑨ 《蒋介石日记》，1940年7月31日，本月反省录。

⑩ 《翁文灏日记》，第483页。

⑪ 《蒋介石日记》，1940年6月22日，上星期反省录；6月29日，上星期反省录。

⑫ 《蒋介石日记》，1940年7月10日。

⑬ 《蒋介石日记》，1940年7月18日；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第283页。

“遭无穷不测之祸害”。^① 英国此举在华盛顿也造成不利的外交氛围,^② 但风雨飘摇的英国都已顾不上。此时,对苏关系仍未回暖,滇缅路通道又中断,而“美国对华虽好意,但目前宁急于救英,血浓于水”,^③ 欧战也分散了美国对远东的关注和援助。

山重水复之际,德国问题又跳出来。这次国民政府是想“联德”,并与撤退驻英法大使问题联系起来。中方一些高层震惊于德国在欧战中的巨大胜利,主张通过联德及撤使,抗议英法行径,并设法使德国控制下的法国对越南运输网开一面。王世杰坚持此时如联德,“必立失美英同情,无殊自杀”。7月10日,蒋召集核心成员讨论外交,王宠惠、张群“仍倾向于与德人敷衍”,王世杰“力言”“我外交政策不可变更”。17、18日,孙科仍主“亲苏联德”,王世杰、吴稚晖反对,而附和孙科的人较多。^④ 但相比于欧战爆发之初的迟疑、反复,这一次蒋很快作出最后决定。7月19日,蒋还在自责欧战爆发时“不自谋外交出路,犹望英法得胜”,指为“不智之至”;^⑤ 而第二天,他就否决从英法撤使及退出国联的主张。^⑥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因素再次起了关键作用。7月4日,蒋收到“美总统劝我持久抗战之理由”。^⑦ 7月16日,胡适致电蒋,强调“对美国应有信心”,“今日惟此一国具有镇定远东力量”,“美国政府领袖确有心助我撑持”,并“正考虑声援中国方法”;而英国封锁滇缅路及“劝和”只是缓兵之计,不是“有意卖我”。^⑧ 此时,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特使抵达美国,也加强了中美高层之间的互动。7月底,美国连续宣布对汽油、废铁、石油等实施禁运。8月1日,王宠惠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上报告,“美政府正式告我,将助我到底”,并“深信中国抗战必获胜利”。^⑨ 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成立,消除了日本加入英法阵营的隐患和中方联德的可能。10月18日,滇缅路重新开放。此后,战时外交虽不尽是坦途,但国民政府随国际局势变化而摇摆起伏的心态有所改变,以美国为外交重心则彻底成为定局。

结 语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外交重心几经变迁,始由英苏并重,进而出现一段外交中心的多元化,最后于欧战爆发后,基于美国作为最后及决定性因素,确定以美国为决定欧战政策“标准”,并确立“首重美国”的外交重心。由于这一变迁过程的连续性和复杂性,前人若拾取其中一段,便形成中国战时外交是由英美/苏联/欧洲为中心转向以美国为重心的不同说法。从方法论来说,前人相关研究多为双边或中方为主的单边视角,集

① 《国民政府对英国封锁滇缅路声明》(1940年7月1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外交》,第575页。

② B. J. C. McKercher, *Transition of Power: Britain's Loss of Global Pre-eminence to the United States, 1930-1945*, p. 305.

③ 《翁文灏日记》,第484页。

④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第281、283页。

⑤ 《蒋介石日记》,1940年7月19日。

⑥ 《翁文灏日记》,第494页。有关此次国民政府内部对联德的争论,参见左双文:《转向联德,还是继续亲英美?——滇缅路事件后国民党内曾谋划调整外交路线》,《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

⑦ 《蒋介石日记》,1940年7月4日。

⑧ 《胡适致蒋介石电》(1940年7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54页;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第282—283页。

⑨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第286页。

中探讨某大国与中国的关系或中国的外交政策，头绪较少而便于操作，对该国与中国的纵向关系有系统之观察，但容易忽略同一时间另一些大国的重要性及各大国之间的横向关系。本文将战时外交置于多边关系框架，从较长时段及纵横两个维度考察英法美苏德等主要大国与国民政府的交往及其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动态、立体地呈现战时外交重心转移的轨迹及同期国际竞争的复杂面貌。

战时国民政府的外交活动及其重心转移，主要建基于蒋介石等对中日之战乃“世界战争”的特殊认知。抗战前，蒋廷黻即把中国获取外援视为理所当然，因为“势力均衡一有大动摇，无不引起国际大战的。就是直接受害者不抵抗，不求援，‘不速之客’式的外援是要来的，何况直接受害者纵不抵抗，也知求援呢”？^① 蒋介石则视中国为“世界各国的公共殖民地”，同样认为若日本“要将中国来做他一个国家所独有的殖民地，就先要同世界各强国来决战”。^② 在战时，每当外援无望、敌友难辨等外交困难时刻，中方便强调本国的自强、自立及不应依靠外援，但始终坚信中国抗战乃“世界战争”，这是推动国民政府广求“与国”并改变外交投放重点的动力。

国民政府抱定中日战争乃“世界战争”，力求“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③ 总体方向和原则固无可厚非。但对国民政府来说，国际局势的变动有时太慢，有时又瞬息万变，而且“未必能每一变迁均属有利于我”。^④ 中方认定中日之战为“世界战争”重心，而英法美苏却优先处理欧洲难题。各主要大国既互相牵制，竞相抱团，又极力保持对外的独立性、灵活性，在大国博弈中留有余地和后路，“强国均因时而变，甚至列强中之最强者也并不能总是达到它所追求的目标”。^⑤ 这既造成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阵营定型缓慢，也造成中国抗战国际环境的复杂，中国只能付出巨大牺牲勉力抗敌。从根本上说，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仍缺乏足够的战略定力，对抗战“内外”关系的把握时有失衡，一旦外部环境恶化，内部即呈彷徨、混乱，甚至功利性地企图对德宣战或“联德”，外交政策随之起伏摇摆。不过，中国最终维持住国内团结与政党合作，坚持抗战到底的路线，从而熬过全面抗战前期的难关，迎来更为有利的国际变局，使抗日战争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作者肖自力，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广州 510631；蔡梓，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 210023〕

（责任编辑：刘 宇）

① 蒋廷黻：《论外援》，《外交月报》第1卷第3号，1932年，第16页。

② 《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上）》（1934年7月13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2，第304页。

③ 《中国抗战与国际形势——说明抗战到底的意义》（1939年11月18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6，第577页。

④ 《蒋介石关于欧战前之国际形势的谈话》（1939年8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外交》，第72页。

⑤ B. J. C. McKercher, *Transition of Power: Britain's Loss of Global Pre-eminence to the United States, 1930-1945*, p. 342.

The Tanaka Cabinet' s Policy of Supporting Chiang Kai-Shek and Oppos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ang and Japan (1927-1928) Wang Meiping (97)

After the April 12 counter-revolutionary coup, Japan' s Tanaka Giichi Cabinet, bearing in mind Japan' s competition with the Soviet Union in China, its own anti-Communist ideology, and the maintenance of its colonial rule over East Asia, promoted policies targeting China' s national revolution. These included "abandoning Wuhan and supporting Nanjing," "a compromise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and "supporting Chiang in defeating the Communists." Japan thus became the spearhead of the imperialist powers' anti-Communist policy in East Asia and was an important external cause of the Wuhan national government' s rift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Supporting Chiang in defeating the Communists," and "separating out Manchuria and Inner Mongolia" were two elements of Japan' s strategy against China that were launched at its Oriental Meeting. Japan' s actual intent was to bisect China along the Great Wall and the Yangtze River in order to protect its privileges in Northeast and North China and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Therefore, Japan and Chiang Kai-Shek cooperated under the aim of oppos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However, when Chiang crossed the Yangtze and went north, Japan adopted a policy of supporting Chang Tso-Lin against Chiang, causing the final collapse of Japan' s cooperation with Chiang. Thereafter, "opposing the Communists" set the basic tone of Japan' s China policy throughout the fourteen years of its war of aggression.

The Shift in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s Diplomatic Focus within a Framework of Multilateral Relations (1937-1940) Xiao Zili and Cai Zi (117)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full-scale Anti-Japanese War, influenced by the ideas of "world war" and "international resolution,"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had both wartime characteristics and prewar inertia in the diplomacy, focusing on forming alliances with Britain and the Soviet Union. From October 1938 on, conflict between the US and Japan in the Asia-Pacific intensified, and the US began to take a positive role in aiding China to resist Japan. However, being then under constant pressure from Europe, Britain kept compromising with Japan, leading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o start reordering the relative primacy of its relationship with Britain and the US. Wartime diplomacy presented a diversified situation in which Britai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S were of equal importance. During August and September 1939, Germany and the Soviet Union signed a non-aggression pact and war erupted in Europe. To join the British and French camp and at the same time find a joint solution to the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 war in Europe,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t one time considered declaring war on Germany or recalling its ambassador. However, given that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was far from clear, it decided to align with Britain and France, but without making this public. The US factor was of vital importance in this course of action. It was not onl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s standard for its policies on the European war but also its new diplomatic focus. After 1939, the U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ts aid to China, cooperating with and consolidating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s foreign policy of putting the United States first. Correspondingly, Britain and the Soviet Union fell back to the "second front" of the government' s foreign policy.